

冀中回忆录

吕正操



解放军出版社

冀 中 回 忆 录

吕 正 操

解 放 军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四 年 · 北 京

冀中回忆录

吕正操 著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平安里三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$7\frac{5}{8}$ 字数 146,000

1984年6月第一版 1984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40,000

书号：10185·51 定价：~~1.20元~~
1.35元



抗日战争时期的吕正操



一九三八年四月，吕正操（船帆下站立者）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。



一九四二年春节，吕正操和群众一起会餐。



一九四二年五一反“扫荡”时，吕正操在前线。



吕正操骑着缴获日军的洋马，佇立在滹沱河畔。



一九四三年，吕正操出席晋察冀边区参议会。前排右二为吕正操、右三为聂荣臻、右四为肖克、右五为刘澜涛，



八路军穿行在青纱帐间，机动灵活地打敌人。

目 录

引 言

第一章 走向抗日救亡道路

- 一 驻防冀中 (3)
- 二 从永定河到梅花镇 (13)
- 三 小樵改编 (18)

第二章 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

- 一 回师北上 (24)
- 二 打开高阳 (30)
- 三 路西整训 (39)
- 四 收编杂色武装 (46)
- 五 破路和拆城 (58)
- 六 成立冀中区党委 (62)
- 七 建立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 (64)
- 八 成立冀中行署 (75)
- 九 冀中抗战的“黄金时代” (79)
- 十 知识分子的作用 (93)
- 十一 反磨擦 (100)

第三章 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

- 冀中部队的正规化 (111)

二	贺龙同志和他领导的一二〇师	(117)
三	敌人的五次围攻和三次“扫荡”	(132)
四	白求恩大夫来冀中	(142)
五	再反磨擦	(149)
六	打狗运动	(153)
七	保护麦收和秋收	(155)
八	参加“百团大战”	(158)
第四章 坚持和保卫根据地		
一	反“蚕食”	(165)
二	桑园突围	(170)
三	“冀中一日”	(175)
四	马母之死	(178)
五	一次危险的遭遇	(182)
六	地雷战和地道战	(183)
七	三级武装配合作战	(189)
八	革命的两面政策	(193)
第五章 五一反“扫荡”		
一	分析和决策	(198)
二	与敌周旋	(201)
三	掌史战斗	(212)
四	向太行转移	(217)
五	回到晋察冀	(222)
后 记		

引 言

作为一名曾经长期生活、战斗在冀中地区的老战士，我对那里的人民，对那里的河流、村庄、田野，甚至一草一木，都是深深怀念的。同时，也深深怀念死去的战友和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。那时，他们都是年轻有为的好同志，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。

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党领导冀中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，发挥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，和全国人民一道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冀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我们，培育和壮大了人民子弟兵。如果没有冀中人民的英勇战斗和流血牺牲，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剩下来就很难说了。我虽然不是冀中人，但是我一直把冀中当作自己的家乡。我对冀中父老，一直念念不忘，至今听到冀中的乡音，还是感到格外亲切。

一九三三年热河抗战时，我接任东北军一一六师六四七团团团长后，就驻防北平、良乡、易县、徐水、定县以及石家庄等地，每年春秋两季演习，都是沿平汉路，在北平到石家庄一线进行。虽然当时和地方党还没有接触，可是逐渐熟悉了冀中的地理、人情。一九三七年五月到石家庄后，我们和市委建立了联系，那时已是半公开地开展群众性抗

日救亡活动。七七事变后，我们留在了敌后，在晋察冀分局、军区和冀中地方党的领导下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，直到一九四二年五一反“扫荡”后，才转战到平汉路西。一九四三年八月间，我奉命带冀中部分主力去晋绥；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，又带着两个团的冀中子弟兵挺进东北。我在冀中这块土地上和人民群众休戚相关、生死与共，有十年之久。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残酷环境中，我和冀中的父老兄弟姐妹情同骨肉，亲如家人。那些年，我经常骑马往返经过各村，男女老幼都把我看成自家人。有的老大娘端着碗水，拦住马，不喝就不叫过去。有的村子出大枣，又红又脆，房东老大娘亲手一个个摘下来送给我，要付钱，老人家就说：“动员了吧（捐献了的意思）！”这类事情多得很。每当我回忆起来，总是有一股暖流涌过心头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冀中人民流血牺牲，所受灾难极其深重。广大群众经受了战火的严峻考验，对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。我们作为在冀中工作过的老同志、幸存者，都是历史的见证人，有责任把冀中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写实、写准、写真、写好。在回忆总结中教育自己，传之后世。同时，我完全相信，只要冀中人民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，把战争年代那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传统，继承下来，发扬光大，就一定能够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，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阻力，保证经济更加繁荣，生活更加美好，进一步加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。

第一章

走向抗日救亡道路

一 驻防冀中

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，蒋介石下令不抵抗，东北军撤到关里，背井离乡，家破人亡。日寇逐步占领了东北三省。民族危亡迫在眉睫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。当时，蒋介石对东北军减发军饷，他的嫡系军队发百分之百，对我们先是二八，尔后三七，待遇很不平等。我们受打击，遭歧视，又受“亡省奴”之辱，全军将士对蒋介石极为不满。加上共产党关于抗日主张的影响，以及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、李杜等带领义勇军英勇抗战的推动，特别是江桥一战，消灭日本一个联队，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，对东北军有很大震动。因此，有志之士强烈要求抗日，打回东北老家去。

从我个人讲，我在东北军里，九一八事变前后就受到党的影响。张学良这个人思想很开朗，他的部队里，各党各派都收，什么青年党、共产党、无政府主义者……他都收留。不论什么党，什么主义，凡是有文化、有才能的人，

他都很重视。他把东北讲武堂的一些知识青年送到日本去留学，有的加入了日本共产党，回国后都受到重用。当时我看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，这些人也和我讲有关党的知识和革命道理，对我有不少帮助。他们还对我说：“你不要在城里上层社会混了，要到下边去掌握部队。讲武堂毕业，为什么不去带兵？”这对我启发很大，我一再向张学良要求下去。张学良批评我年轻浮躁，但还是把我派到十六旅任参谋处长。

一九三三年初，东北军在热河抗战，初战失利，退守长城。蒋介石主张不抵抗，在手令中说：“中国的武器不行，越打失地越多。”当时张学良决心打到底，并将主力部队用来防守长城。他要我从前线连夜赶到北平去，亲自对我说，他下决心打到底，并要我立即回去向三个旅传达，准备反攻。同时委任我接任一一六师六四七团团长。料想不到，第二天下午报纸号外就出来了，蒋介石逼迫张学良下野出国，委亲日派何应钦代行张学良的副司令职务，并带来国民党嫡系部队两个主力师，名为“支援”，实则逼迫东北军撤离长城防线。五十三军移驻保定地区。当时，我刚接任一一六师六四七团团长，团内官兵对蒋介石停止热河抗战，强迫东北军撤退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。

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，东北军中就有人酝酿兵变。当时有的团已有少数党员，在团里宣传抗日。不久发生廊坊兵变，失败后团长杜长龄（在日本留学时入党）跑

到新疆，后来被盛世才杀害。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党的，他参加了廊坊兵变。

六四七团于这一年三月底移驻到易县县城及附近农村，当时骑兵二师黄显声部驻在易县西陵、良各庄一带，离我团部只有十五里。我和黄显声是老同事，常有来往。骑兵二师已有党员和进步学生当兵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，都是中共北方局军委派到该师工作的。此外还有党的外围组织“反帝大同盟”，又有北方局五十三军工委会成员刘澜波、孙志远等在该师领导地下党的工作。我在那里结识了刘澜波、孙志远，此后，经常来往，互相商讨在六四七团内如何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

蒋介石歧视、消灭杂牌军，尤其对东北军内共产党的活动特别注意。当时张学良有位秘书潘冬舟是共产党员，被蒋介石的特务发觉后，蒋介石来电指名要把潘冬舟送交他处理。张学良怕暴露东北军内共产党的关系，便“挥泪斩马谲”。之后，他答复蒋介石说：“这个人我一经发现，就把他杀了。”

一九三四年春，六四七团移驻北平，担任城防期间，我和孙志远、刘澜波时常见面，就团内具体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进行交谈。在团内开始成立有士兵代表参加的经济委员会、图书馆、俱乐部、体育队等组织，办有救亡小报，提倡官兵平等、民主生活和开展抗日救亡教育。并由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派来东北大学进步学生顾少雄、张绍清

等在团内协助宣传教育工作，教战士们唱救亡歌曲，在连队里组织读书班，公开进行抗日救亡活动。

我团为保卫北平城防和日寇常有冲突。当时驻东交民巷的日军不断向我城防部队挑衅，企图寻找借口侵占北平城防，屡遭我值勤部队坚决抵制，迄未得逞。一九三五年六月，石友三部叛变投敌的铁甲车队队长白坚武，勾结日寇企图用铁甲车冲进永定门东边的城豁口，与日寇里应外合侵占北平。当时叛军先用炮击，炮弹落在二龙坑路，引起市内人心惶恐。我得知情况后，立即带部队乘汽车奔赴永定门城豁口进行堵击。经我部炮击铁甲车，叛军即行后退。与此同时，我团派出部队到丰台截断其后路，前后夹攻围歼，叛军全部覆灭，我军无一伤亡。当时人心振奋，群众纷纷打电话、写信或前来我部慰问。同时，还有欧美驻华使馆的武官和记者也到永定门上的指挥部参观、采访。我团官兵受到很大教育和鼓励。其中有个美国驻华武官纳尔逊直接向我表示同情和赞扬。抗战后，他曾两次来冀中抗日根据地找我，进行参观、访问。

此后，正值一二九北平学生救亡运动高潮，我团官兵主动配合，给以同情支持，同时自己也受到教育和锻炼。我团于权伸一个连驻守西直门，当游行学生遭警察拦截时，便迫令警察开门，援助学生进城。在市区内，当游行的学生被警察追赶，我团部队即装作把学生队伍包围，赶到一所大院里，躲过追赶的警察以后，就把他们放走了。受到

了进步青年学生的欢迎和称赞。

不久，北平城防移交宋哲元部队，日军立即占领朝阳门，城防部队被缴械。此后日军随便出入，在市内市外横行无阻。

一九三六年初，我团移驻河北徐水一带，我和黄显声、孙志远等经常接触。

一九三六年八月间，本来张学良因提升一一六师师长缪徵流当五十七军军长，叫我接任一一六师师长。万福麟反对我升任师长，他和缪徵流背着张学良，把我送到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；同时由缪徵流去西安见张学良，借口已送我入学，而力保其亲信刘元勋接任了一一六师师长。我到南京后，和一个横行霸道的国民党特务发生冲突，打伤了他，国民党的报纸，用大字标题登着“东北军军阀吕正操行凶打人”。张学良得知后，立即电令我回部队。九月间我回到北平，在北平和东北抗日联合会（东北救亡总会前身）商讨筹组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，作为东北抗日联合会组织之一，推我任总队长。张学良又于十月间，调我临时到西安张学良公馆服务。他亲自选些认为靠得住的人参加政治工作小组，准备在东北军里建立政治工作。同时，我参加了张学良组织的“东北革命军人同志会”。

西安事变时，我在张学良公馆担任内勤工作，就住在张学良私邸C楼。周恩来同志一行十二人到西安后也住在同一栋楼内，当时我和周的随行人员罗瑞卿、许建国常有

接触，和参加西安事变的地下党员刘鼎、宋黎等朝夕相处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，张学良身着戎装（张学良平时很少穿军装）来到我们住处，告诉同志会成员说，他即将伴送蒋介石回南京。我们都感到很惊讶，劝他不要去。他坚决不听，还说三日内准回。当时我们认为蒋介石绝不会放他回来，他既不听同志会的劝阻，也不告知周恩来同志，就匆匆下楼自己开着汽车送蒋介石赶赴机场，一同登上飞机。当周恩来同志得知并即刻赶到机场时，飞机已经起飞。

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后，东北军内部矛盾重重，高级军官和少壮派争权夺利，斗争激烈，混乱局面难以收拾。我考虑当时六四七团的政治情况，还是比较有把握的，于是在张学良走后，于十二月三十一日，乘第一班民航飞机至郑州，接着又坐火车赶回徐水团部，抓紧掌握部队。随后孙志远赶来团部，通知我北方局已同意我入党。我想留孙志远在团内做党的工作，他说：在五十三军他太红了，要到山西躲一躲，北方局另派人来团主持党的工作。

回到徐水的当天晚上，我就把沙克找来了，告诉他说：“西安事变后，蒋介石一手造成的祸国殃民的内战就要停止了。”接着，我向他讲述了共产党如何光明磊落，为国家民族利益不念旧恶，英明地处理了西安事变。并且还对他讲：“我们共事多年，算得上是知己。不瞒你说，我已经加入共